

《思想香港》第一期（二〇一三年八月）

0371 十週年，試檢視反對運動的三條思想主軸

文/陳景輝

今年是 0371 十週年，筆者想從自己的社會運動經歷，梳理一下不同時期公民社會中反對運動的重點。

回想，我和這個城市的交匯處，是在近 10 年爆發的社會運動。

讓我自我介紹一下。2003 年可說是我人生的分水嶺。那一年，我加入了一個因七一之後成立的組織「七一人民批」，參選區議會選舉，成了當時的最年輕候選人。21 歲的我，以七一新世代的面貌，成為部份媒體焦點，口齒不清的說著書中拿來的民主道理。

2005 年，我經歷了韓國農民的反世貿示威，近距離見識到貨真價實的勇武鬥爭，吃了人生首次的水炮；接著在 2006 和 2007，我們一代人發起天星皇后的保衛戰，高舉本土身份和直接行動的旗幟；2010 年，則是八十後反高鐵運動，我們心繫著新界菜園村；去年，在反國教運動中也有幫手，有幸見識到 90 後網絡世代的運動方式。

我想把這 10 年的反對運動分成三條思想主軸，它們分別代表著三種解拆權力，形成反對觀念的思考途徑。

1. 頌揚差異的時代

2000 年初，我開始參與社運，那都是一些跟多元身份認同有關的新社會運動，例如同志運動和青年運動。所謂社會運動，並不像今天般模糊不清，社運明確區別於純粹以普選和參選做為主要目標的政運。社會運動存在多元化戰線，人們也深知社會宰制來自於多個源頭(例如環境、性別和年齡，涉及不同的權力關係和價值系統)，並存在各式根深蒂固的歧視和排斥，凡此，並不靠一張選票可以克服。

以上的社會運動，有一重要信條，那就是崇尚差異與多元。老師經常提醒我們，很多社會裡的二元對立(例如同志 vs 異性戀)，它們其實不涉及高低之分(正常或病態)，而是純粹差異而矣。

同一時期，牛棚書院出現，很多文化人、知識分子和社運人也都在那裡交換進步的思想知識和主張。這時間，法國理論思潮影響我們很深，像是福柯的權力理論、李維史陀的結構人類學和羅蘭巴特的神話學，就算沒有真正讀過他們的著作，也會受他們所引發的

思潮和傾向影響。像是李維史陀很有名的斷言，象徵較它所象徵的更為真實，這在我們一代人的批判意識中，播下了重視文化作用和符號效應的種子。

在此，我們一方面很著重流行文化、日常生活方面的文化批判，同一時間，對於解放(or 出路)的了解，則是把目光放在主流之外的另類構想。這類構想通常來自人類學研究、其他地方或少數族群的個案經驗，倡議另類教育、另類經濟、多元情慾，等等。

留意一點，這種批判追求的是邊緣、另類、差異、多元，而對主流並沒有取而代之的準備。

2. 強調本土和領導權

2006 和 2007 年，我們開啟了城市保衛戰。我們開展了圍繞本土身份和重構地方經驗為主的反對運動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，是衝進天星碼頭之前的一個小研討會。

零六年底我們闖進天星碼頭，之後引發了許許多多圍繞歷史、空間和主體的本土論爭。但在之前，並沒有什麼人會把「本土」兩字掛在心上，甚至抱持相當懷疑的態度。恰巧行動前數天(當時尚未形成闖入的念頭)，我們一班朋友參與了一場討論會，講者之一是馬國明。過百人擠在尖沙咀一個會議廳中，討論關於本土身份認同的問題。懷疑聲音此起彼伏，但我清楚記得馬國明如何地斬釘截鐵：「本土就是追認我們自己受壓迫的祖先、未完成的希望。」在闖進天星、守護皇后的時間，我們幾個人--至少包括朱凱迪、周思中和我--惦記的就是這番說話。

另一個值得重提的是喜帖街運動。

大約零五年前後，我在灣仔一間社福機構掛單，當一個社區工作人員。其時，爆發於灣仔老區大大小小的居民運動方興未艾，而運動方向本身又恰逢一場範式轉移。轉移什麼範式？簡單說，就是在運動方向上從強調「合理賠償」轉向「社區保衛」的理路，並從根本上否定市建局用錢解決一切的賠償邏輯，然後肯定社區住民、網絡、文化及歷史的價值。

後來的天星皇后碼頭運動裡的本土觀念，就是從老社區承載的文化紋理、城市價值和生活智慧中生長出來。

這時候的反對運動，不再說那麼多另類、差異、邊緣、多元等觀念，比較強調一種本土地方認同，並企圖以一種新的全民觀念(「小區小店」、「天星碼頭的文物建築價值」和「六六年絕食反加價的本土抗爭傳統」所象徵的)替代舊香港的主流秩序(以地產霸權為

象徵)。

補充，在天星皇后反高鐵運動中，當時的主流秩序相比今天強大得多（今天香港主流意識型態面臨更大危機）。因而，我們在考慮反對運動策略的時候，依然重視建立不同社會力量的聯盟，以及知道社會的主流意識根深蒂固，唯有通過各類象徵性社會運動(如苦行)，企圖轉化，而非自信可以立刻推翻。

3. 新近的轉向，立刻推翻的時代，或敵意失控的革命狂熱

近年，反對運動的蓬勃成長，當然綻放出推進社會的光明一面（例如 90 後引爆的反國教運動），但另一邊廂，也有其陰暗一面。

例如，以網絡為基地，活躍於政壇的政治激進派，便終日沉溺於「同路人危機」此一自製稻草人，不斷黨同伐異。網際網絡上，以民主之名發出的惡毒攻擊，層出不窮，甚麼左膠、飯民、大中華膠、佔領光環、賣港賊、雲端文化人或維穩社運等，數之不盡。

這就是我所謂的陰暗面，即：敵意，以其最本能的方式爆發，敵人的涵蓋範圍不斷擴大，不僅要打倒舊敵人(如建制派)，還將槍口對準所有溫和主義、路線不同者、以及任何對於社會變革，反應遲緩的人群、事物或惰性。政治，彷彿成了一樁只有敵人而沒有客觀限制的反對事業，籠罩在一股無根的革命狂熱之中。

在此，激進反對運動以一種雅閣賓式的革命人民話語，不斷爭奪能夠象徵「人民」的正當性。在此，一系列二元對立構成這種人民的象徵性：溫和 vs 激進；妥協 vs 原則；維穩 vs 抗爭；賣港 vs 本土；和理非非 vs 勇武，等等。每個對立中，前一項代表出賣人民，後一項才是能夠為人民說話的正式代表。

在此，所謂人民，只是一種純粹以原則價值和同一性構成的價值變形物，它失去了一切社會的實際內容。

4. 反對運動的貧乏

近年，我反覆思索的就是此一敵意失控和蔓延的現象，思想它到底出了甚麼毛病。

如果以前兩階段來對比，可說當下反對政治失去了尊重差異的能力，而且也再沒有耐性以霸權(hegemony)的邏輯分析主流秩序，我所謂霸權的邏輯，是基於對統治的了解，和關於建立歷史性反對聯盟的想像。

在上述革命狂熱所描繪的政治圖像中，人民已處於水深火熱，統治已失去所有正當性，

建制秩序隨時倒下，只欠人民一次起義，送它一程。在此種圖像背後，預設了一個「簡化」的權力分析，其中，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就只剩下赤裸的權力支配，瀕臨瓦解的主流權力再沒有任何說服力。然而，情況不是這樣。那股覺得「當下可以推翻一切」，從而敵視一切的革命狂熱，通常都是低估了客觀形勢的艱難險惡，脫離歷史現實。即使今日香港面臨主流秩序日漸瓦解的局面，但它的殘餘、碎片和餘溫仍然是舊世界抗拒轉變的一股強大的社會穩定力量。

我認為重溫文化研究裡，有一個觀念叫做霸權的觀念，有益於當下。文化研究裡，有一個觀念叫做霸權，它告訴我們，「統治」並非單純的壓迫，而是說進行得遠比想像複雜。「統治」，它所採取的方式，不只是簡單的鎮壓和威迫，而是利用一籃子為人接受的大道理和意識形態，來贏取大眾認同。

其次，在當下那股革命狂熱之中，似乎失去了政治上創造朋友的一面。常說，政治是敵友之分，因而，沒有敵對並不構成政治，但其實人們談得較少的是，若然政治上沒有朋友，也同樣成就不了政治。

從朋友一端思考政治，它便意味著友愛、互惠、聯合、團結和結盟。它的政治性格，體現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，那就是，反對運動若要成功，它必定是建基於廣泛的社會連結和合作之上。反過來，胡亂樹敵，只會使自己陷於孤立。因而，政治必須為陌生人、朋友、盟友和意見不同者，努力創造出廣闊的政治合作空間，或至少贏取廣泛的支持和認同。

就是說，政治的困難之處，也許不在於四面樹敵，而是如何創造朋友，如何將社會不同力量拉到自己的一邊，建立足以跟統治當局匹敵的反對者聯盟。

5. 小結

零三年至今，十年來，這個城市的論爭和對抗有增無減，如果要濃縮成一句話，我會說，這是香港社會「反對意識」茁壯成長的十年。

筆者希望以自身經歷和觀察，嘗試疏理和分析。凡此種種，就是不想「反對」這個概念變得庸俗化，我想，沒有比台灣政治學者錢永祥說得更好的了，讓我引述他一段話作結：

「『反對』這個概念的庸俗化，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殘忍，因為這代表對抗庸俗化的最後防線也告失守」。

「反對」，既是社會的最後防線，也是進步希望，因而有了這篇反省。